
《中国文化》简介

方明东

《中国文化》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出版的综合性学术月刊,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之一,中国文化社编辑出版。1940年2月创刊^①,每卷6期,16开本,出至第3卷第3期后,于1941年8月停刊,共出15期。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新文字、考古等方面,设有“研究”、“短评”、“杂论”、“哲学讲座”、“创作”、“读书随笔”等栏目,刊有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著作。艾思奇、吴玉章、茅盾、周扬、范文澜、尹达、张仲实、萧三、张庚、胡蛮、叶蠖生等为主要撰稿人。1966年5月,人民出版社将《中国文化》合订本影印出版,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运动,是在边区文协(全称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或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组织领导下开展的。成立于1937年11月24日的边区文协,既是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总的领导机关,负责统一领导边区各文化部门的工作,又是一个极为广泛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几乎边区所有的文化人和文化工作者都是它的会员。边区文协对于边区乃至全中国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伴随着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倒退,文化思想的专制、复古,导致进步的文化处处受到限制和打击。国民党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严重地威胁到抗战的进行,

^① 因印刷原因,《中国文化》创刊号到1940年3月才问世,参见《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二期“编后记”。

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文化的方向和出路问题。为此,经过充分准备,边区文协于1940年1月4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延安各界代表近400人出席,毛泽东、张闻天作了重要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报告,通过了大会总决议及其他议案,确定了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决定编辑出版《中国文化》、《通俗读物》、《边区群众报》等刊物。

《中国文化》是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产儿,宣传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它原本拟编辑“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专号”;后因稿件太多、篇幅所限,遂将有关重要报告和文件陆续刊出。其中主要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洛甫(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艾思奇的《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及杨松、罗迈(李维汉)、萧向荣分别作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战时干部问题、八路军的教育问题的报告。另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章》。

《中国文化》上登载的师田手的《记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报道文章,与《新中华报》刊登的社论和叶澜的报道,是目前可以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边区文化界这次盛会详细记载的第一手资料。

边区文协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毛泽东、洛甫在报告中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和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并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概念。正如茅盾当年在读了两人的报告后所指出的:这两篇报告“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给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①这两个著名报告都是最先在《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毛泽东的报告后来以《新民主主义论》

^① 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见《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以后凡引自《中国文化》的文字不再一一注出。

为题发表有多种版本,也作了一定的修改,而在《中国文化》上登出的,则是报告的第一次修改本,应该说基本上保存了报告的原貌,弥足珍贵。

毛泽东和洛甫的报告,都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总结了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尤其是“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或文化革命的历史。就文化的基本理论、旧文化的构成和性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和特点、新文化的内容和发展方向、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等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主要问题进行回答,并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他们对以上问题的见解,超越了近代以来的所有的文化学者和文化派别。

毛泽东和洛甫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和表述上又有些微的区别,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分期、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估价及如何对待古代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主张。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容的表述上,区别更明显。毛泽东最初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归纳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洛甫则表述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后来,毛泽东似乎也注意到他的表述有些欠完全,因而在文中加上“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按毛泽东的说法,“民主”的内容被归入“大众”的涵义之中,“民主的”仍没有被单独列为一项独立的成份加以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在边区文协大会上,王明在他的报告中将新文化的内涵归纳为“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民主的,基础是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的”。^①这样看来,新文化或新民主主义文化包含民族、民主、科学、大众的内容已是陕甘宁边区中共党内比较一致的见解,只是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和系统的表述而已。在表述上,张闻天的提法似乎更完整、确切、严谨一些,另外,在新文化的形式问题上,毛泽东习惯用“民族形式”一词,而张闻天则更喜欢用

① 《新中华报》第九十八号,1940年1月20日出版。

‘新形式’的提法。表面看来,‘民族形式’似乎比‘新形式’更具体一些,但从以后的实践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提法实际更为抽象,容易引起误解与偏向。

毛泽东、洛甫等在文化问题上的异同,表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建构时期的特点。当然,二人报告的视角不同,也是发生差别的原因。毛泽东着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说明中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动向,阐发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文化问题只是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部分。洛甫的报告则是专门讨论抗战以来的文化问题,更注重对文化本身的考察,富于政策性,故当时他的报告又被称为‘文化政策’报告,他的报告对于了解抗战时期文化界的动向及中共的文化政策有重要价值。总之,毛泽东和洛甫的报告代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最高理论成果,而《中国文化》及时反映并保留了这一理论成果,给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原始资料。

二

抗战时期进步文艺界讨论最热烈的莫过于‘民族形式’问题。它既是30年代初文艺大众化讨论的继续,又是抗战新形势下的产物。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向思想文化界提出了‘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代替‘洋八股’和教条主义的要求。从1939年起,重庆文艺界和延安文化界即以此为中心展开‘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更明确地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样,‘民族形式’问题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形式问题联系起来,讨论更为热闹。

早在1939年下半年延安的讨论中,陈伯达就片面强调旧形式在创造民族形式中的作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估计不足。1940年3月,向林冰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文章,将陈伯达的观点

向前推进,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民间形式,“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在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上,只能置于副次的地位”。向林冰的观点立刻受到葛一虹的批判,但葛又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我们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完全否定旧形式有可取之处,认为旧形式只是历史的产物,当历史向前发展了的时候,旧形式的命运只能是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利用旧形式是“降低水准”。显然,不论是向林冰,还是葛一虹,在民族形式问题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延安也是讨论的中心,《中国文化》刊出了这方面的主要文章:周扬《对旧形式的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茅盾《论如何学习民族的形式》和《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陈伯达《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王实味《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

周扬认为,形式是受内容决定的,因而新文化应该以发展新形式为主,但旧形式(主要是民间形式)有广大的社会基础和优良成份,应该加以利用和吸收,这不但与发展新形式相辅相承,且正是以实现后者为目的。必须把学习和研究旧形式当作认识中国、表现中国的工作之一个重要部分,把吸收旧形式中的优良成果当作新文艺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必要源泉。当然,对旧形式也要作艺术上思想上的改造。

茅盾的《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既是一篇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文,又是茅盾第一篇讨论中国文学史(小说史)的著作。茅盾认为学习民族形式,一要向中国文学遗产中去学习,二要向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学习。他认为,在民族文学遗产中,只有百分之一是代表了极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表达了人民大众的爱憎的作品,在这中间,才有我们的文学形式或文学的民族形式,这就是“市民文学”。茅盾指出,富有反封建意识的民间文学,虽也有许多优秀作品,但在形式上则无突破和创造。而市民文学经过长期发展,到晚期(明末清初),从艺术观点看,形式和内容都是臻

于成熟而完美的,其代表作是《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才是中国民族形式的代表。此文是茅盾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讲演稿。

《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一文是茅盾专门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重要著作。在文中他分析了向林冰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观点的三点错误,对旧形式、民间形式和民族形式在概念上进行了辨证。他认为,民间形式是旧形式的组成部分,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落后的。那种片面强调旧形式或民间形式的作用的人,是把旧形式或民间形式的一些“特征”误以为是代表“民族形式”的,殊不知这些特征正是封建经济的产物。因此,民间形式不能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它们是封建社会所产生的落后的文艺形式,只能作建立民族形式的参考或滋养料之一。新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吸取过去民族文艺的优秀的传统,更要学习外国古典文艺以及新现实主义伟大作品的典范,要继续发展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于今日的民族现实,提炼熔铸其新鲜活泼的质素”。民族形式的建立的任务,新文艺作家们应当仁不让。

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一文是1940年5月31日完成的,文章就“民族形式”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比较成熟的意见,是讨论“民族形式”的重要文章之一。郭沫若强调对创造“民族形式”的正确理解,指出:“‘民族形式’……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他认为“民族形式”这个新的要求,并不是要求本民族过去时代所创造的任何既定形式的复活,而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并不是要把新文艺的历史和价值全部抹煞,而认定民族形式应由民间形式再出发,并以之为中心源泉。他反对把民间形式视为民族形式的唯一中心源泉的观点,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只能是现实生活。郭沫若认为:“将来究竟会成就出怎样的一些形式来,这是很难断言的。但我们可以预想到一定是多样的形式,自由的形式。人类的精神是更加解放了,封建时代的那种定型化,

我们相信是不会有。郭沫若将民族形式看成是多样的、自由的、反映民族特点和时代需求的新形式的见解,是独到的、深刻的,超过了其他人的观点。

延安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避免了向林冰和葛一虹那样极端的片面的观点,对民族形式的建设发表了许多宝贵意见,这些都在《中国文化》上反映出来。王实味的文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发生的偏向进行了探讨。争论的中心仍然是如何对待民间形式或旧形式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发表了胡蛮的《鲁迅对中国民族文化与民族艺术的意见》,意在介绍鲁迅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以资借鉴。

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国文化》除反映了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的情况外,还发表了冼星海、柯仲平关于中国民歌的论文,冼星海的论文从音乐角度对中国民歌进行研究,弥补了以前只从文学角度研究民歌的不足。胡蛮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批评的文章5篇。此外,《中国文化》还载有何平之、茅盾、何其芳、丁玲、沙汀、刘白羽、陈荒煤、艾青等人的小说、诗歌和文学批评作品,亦可一观。

三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学习的号召,中共中央并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其后,延安各界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哲学、历史的热潮,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文化》较全面地保存了这些成果。

《中国文化》刊载了张仲实、萧三、杨松三位研究马列主义的专家宣传介绍马列主义的诸多译著。如张仲实的《怎样研究 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遗产》、杨松的《列宁论中国》、萧三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及译文《论艺术工作者应学取马列主义》等,对于宣传、学习马列主义起了重要作用。艾思奇撰写了“哲学讲座”系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通俗的介绍。他的《论中国特殊性》一文,充满了辩证法思想,是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至今仍有指导意

义。《中国文化》还登载了王学文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陈唯实的《史大林发展了关于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及和培元的遗著《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等论文。刊物还介绍了康德和黑格尔的生平和思想。

《中国文化》并关注苏联社科界的动态。30年代末苏联国内开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动力问题的讨论,《中国文化》先后刊出了张仲实翻译的讨论中有代表性的4篇文章,对不同的观点进行了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延安史学研究的水平和成果,可从《中国文化》中窥见一斑。古代历史的研究仍然是当时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争鸣的中心仍然是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文化》先后刊登了范文澜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问题》和《关于殷商史料问题》,谢华的《略论殷代奴隶制度》,叶蠖生的《从安阳发掘成果所见的殷墟时代社会形态的研究》诸文,较全面的反映了争鸣中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取得成果,《中国文化》连载了该书秦统一之前的章节,从而保存了此书最初的面貌。另外,《中国文化》还刊登了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叶蠖生《在青铜时代的埃及社会》、立波《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及和培元《逻辑史鸟瞰》等。这些加上前述的胡蛮的美术史,可见延安当时史学研究拓展的广度和深度。

范文澜是1940年才到延安的,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负责编撰《中国通史简编》,这是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我国历史的新著,其开创之功,不同凡响。《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是范文澜到延安后写的有关古史分期问题的第一篇论文,文中范文澜赞同吴玉章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认为西周已开始了封建社会,虽然氏族社会、奴隶社会的

残余保留还是很多,但我们不应误认残余为这个社会的本质。范文澜的这个主张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继续有所论证。谢华在《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一文中也认为殷代末期已是奴隶社会,在这一点上与范文澜是相同的,当时史学界主张殷末已是奴隶社会的还有吕振羽等人。尹达在此问题上,则持不同的观点,他在《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关于殷商史料问题》二文中主张:“殷代后期的社会是在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是没落的氏族社会走向坟墓里去的前夜。”尹达从殷商时代的史料、生产工具、主要经济基础及社会组织机构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一身二任,把考古学和史学研究结合起来,“从考古到史学研究”是尹达的治学特色,因而尹达十分强调史料的正确运用。在殷商史的研究中,尹达更注重甲骨文和遗迹遗物的作用,认为离开它们,就不可能写出殷商社会的信史。他的上述二文,既是讨论殷商社会性质的文章,又是谈史料运用的文字,颇具真知灼见。

《中国文化》上诸篇文章关于殷代后期的经济基础的认识,大体上已取得一致,都认为农业是主要经济基础,畜牧居次要地位,也都承认殷代后期还存在着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关键在于这种组织结构在殷代社会中的残余还是主导问题,这是两种观点分歧的中心所在。

尹达继 1937 年发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对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提出的所谓“单色陶器早于着色陶器”的理论和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上的错误进行批判后,于 1940 年 1 月 2 日写成《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一文,进一步清算了安特生的错误理论及其散布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时也驳斥了所谓的中国文化“东来”、“南来”和“北来”说。以当时所能掌握的考古资料,结合甲骨文字、古代文献及神话传说,论证了“中华民族和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荣滋长起来的,并不是由他处移植过来的”。他以坚实的史料,批驳了中国文化和人种外来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虽然“在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地区受到外来种族或民族

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否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来源有其独立和自别的特点”。

经学是范文澜所长，《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是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的讲演提纲。他将经学的演变分为汉学系、宋学系、新汉学系三大阶段，层层剥析，脉络分明，是第一篇试用马列主义研究经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的著作，极受欢迎。20多年后，1963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又多次请范文澜去讲经学史，那时他对经学的研究更为深入。^①

吴玉章从20年代末开始致力于汉字改革的研究和实践，40年代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开展新文字运动，“风行一时，卓著成效”。《中国文化》刊载了吴玉章和胡蛮的关于新文字运动的论文及《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缘起》一文，是研究抗战时期新文字运动的重要史料。

整体而言，文化史的研究在抗战史中尚属薄弱，其中原因之一是史料缺乏，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学术刊物更是屈指可数。《中国文化》集中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文化理论的最高成果，较全面地记载了当时文艺界、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讨论的问题，极为珍贵。尤其是在它终刊的前一期（即第3卷第2、3期合刊）的“抗战四周年纪念专号”上，登载了欧阳山、艾思奇、李伯钊、叶蠡生、胡蛮、张庚诸人分别撰写的《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述评》、《敌后文艺运动概况》、《抗战以来的历史学》、《抗战以来的美术运动》、《倒运的一些成绩和几个问题》等综述性质的文章，是研究抗战时期（1941年8月以前）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史料。以上种种，决定了《中国文化》在抗战史尤其是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系）

① 参见《经学讲演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